

# 国家译本的生成： 吴亮平译《反杜林论》改订考察

李佳悦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系统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该书首个中文全译本由吴亮平于1930年译出,后经其四度改订,至1980年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刊行。其间,吴译本的地位逐步演进,一度成为中共党建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国家翻译实践的参考译本,作为国家译本使用。吴译本的翻译与改订历程隐含“为国译”的实践取向,折射出党派译本向国家译本过渡的历史轨迹,并构成国家译本生成的典型案例。在不同改订阶段,译者与国家先后赋予译本以国家意图与国家名义,使其具备了国家翻译的属性及特征。该过程不仅展现了国家译本生成的机制与条件,也揭示了党派译本转化为国家译本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国家译本;译本改订;《反杜林论》;吴亮平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6-0145-10

## 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翻译事业迄今已逾百年历史。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通过翻译进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视为理解国家命运和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工具(陈明明,2015:101)。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持续翻译与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助力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逻辑,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身份”(陈明明,2015:99)。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结,对党内译本提出了在历史变革中把握契机,发挥“国家译本”功用的新要求。国家译本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以1930年吴亮平首译的《反杜林论》完整中译本为例,其问世为中国社会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性认知提供了文本基础。毛泽东曾评价:“吴亮平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者”,“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雍桂良,2009:

收稿日期:2025-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翻译话语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840—2022)”(23JZD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佳悦,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家翻译实践史、翻译理论研究。

任东升,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家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李佳悦,任东升.国家译本的生成:吴亮平译《反杜林论》改订考察[J].外国语文,2025(6):145-154.

162)。此后50年间,吴亮平四改其译本,使译本历久弥新,备受领导人重视,作为国家译本使用。鉴于《反杜林论》吴译本因改订而逐步“国家化”的事实,本文以其四次改订为线索,考察吴译本地位演进和为国家所用的过程及缘由,旨在揭示国家译本的生成。

## 1 党派译本成为国家译本的底层逻辑

探讨党派译本向国家译本的转化,首先需厘清政党与国家的内在关联。一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预设了政党的“社会政治角色”属性,认为政党需通过动员社会支持以“合法进入”国家,因此将其界定为一种“非国家公权”的组织(米勒等,1992:521)。但在当代中国,政党并不是靠选票“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运作”国家的资格,它是靠革命手段“缔造”了国家,于是成为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陈明明,2015:99)。

20世纪初,列强入侵与内政衰败交织使中国陷入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层危机。晚清君主立宪改革的失败,标志着传统帝制彻底丧失推动国家现代转型的能力,促使中国知识精英普遍认识到,唯有依靠高度组织化的政治革命,才能重塑国家制度基础。随着西方政治理念的传入,政党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共识。民国初年,政党组织层出不穷,但事实证明多党体制未能整合分散的社会结构,亦无法有效遏制强大的专制势力,国家建构屡遭挫折。当此之际,政党国家从诸多现代国家形式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先后出现过两个政党国家实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中国首个政党国家机构,奉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理念展开政治实践。但由于国民党未能发展成一个建立在现代革命党基础上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目标明确、掌控国家、绝无对手的超级政党(任剑涛,2014:79),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历史接续。

政党国家是一种融政党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的政治形态。政党作为国家的支柱,承担着“启蒙”和“唤醒”国民的责任,同时在观念和行为规范上对社会进行统摄、规划与引领(陈明明,2015:100)。执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现象与内在要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构成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党章》亦明确强调,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领导全国各民族亿万人民。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耦合以及党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支配地位揭示了作为立党、治国之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党内译本向更广泛面向的国家译本转化的可能性。

## 2 吴亮平对《反杜林论》的翻译与改订

党派译本向国家译本的转化,是政党与国家深度耦合的文本体现,映射出政党通过革  
· 146 ·

命实践缔造国家,并以其思想体系奠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范式。鉴于二者在生成背景、受众定位与政治功能上的根本差异,此类转化往往依赖特定条件。吴亮平对《反杜林论》的翻译与多次改订,作为国家译本生成的典型实例,揭示了其具体转化路径,为探析其生成机制与制度逻辑提供了契机。

## 2.1 吴亮平与《反杜林论》的结缘

吴亮平(1908—1986),笔名吴黎平、吴理屏,是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精通俄文、英文和德文,曾译有《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在中学时期,他即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并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彼时该校主要由俄籍教员执教,中文文献极为稀缺,多数中国学生因语言障碍难以直接研读原著。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建议增加中文译本,校方遂组织通晓外语的学生承担翻译工作。吴亮平因自幼学习英语,具备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被选入其中。他最初根据英文译本翻译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反复研读过程中“产生了把这部巨著全文译出的愿望”(吴亮平,1983:2),就此与《反杜林论》结下不解之缘。

1929年,吴亮平奉中国共产党指示自莫斯科返回上海,进入中央宣传部工作。其后遭受迫害,被下放至法南区基层支部“锻炼”。出于对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的朴素感情(吴黎平,1980:389),他决意借此机会“克服困难在短时间内把《反杜林论》全译出来”(吴亮平,1982)。吴亮平较早认识到“《反杜林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文献之一,现时在全世界上几无国不有此书的译文了”,且“《反杜林论》是一部战斗性著作”,因此寄望其译本“能够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实际的斗争,有所帮助”(吴黎平,1930:10)。他历时三个月,以德文原版为底本,并辅以俄文、日文译本为参照,完成了全书翻译。其初衷是希望译本成为“我国广大介绍正确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微弱的推动”(吴黎平,1940:2)。

## 2.2 吴亮平《反杜林论》译本的改订历程

译本改订,通常指对既有译文所作的修改与订正,其行为主体既可以是译者本人,也可以是出版机构等外部力量。本文所称改订,特指吴亮平本人主导的、兼具再诠释性修正与形式性修订的文本实践。1939年,吴亮平在延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期间,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对《反杜林论》译文进行了首次重校;1954年展开第二次校订,对译文做出较大幅度的修改;1973年,作名词与文字上的校订;1978年,为纪念《反杜林论》问世百年,再次润饰译文,形成定本。可以说,《反杜林论》吴译本的命运同吴亮平的持续改订休戚相关。回顾吴译本的改订历程,把握改订的内容与方向是探明国家译本生成的题中应有之义。

## 2.2.1 第一次:修正不足

1939 年在延安,吴亮平“在毛主席的亲自鼓励和督促下”(吴黎平,1980:389),对《反杜林论》译文作了全面改订。新译本于 1940 年由解放社出版,用作党内学习材料。初译时,“由于译者对于外国文(特别是德文)及理论修养的不足,以及旧俄文本的许多重大缺点,旧译本在好些方面,是有严重的缺点与个别的错误的”(吴理屏,1947:2)。但此后十年间未见新译本问世,恰逢党的领导人带头在全党范围内大力开展学习运动,吴亮平肩负起翻译学习材料的重任,遂开展译本的改订工作,对旧译中的明显问题与不足进行了修正。

首先,着力完善话语形式。1932 年,吴亮平经林伯渠介绍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得知他是《反杜林论》的译者后,常与其讨论书中理论。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1991:534)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吴亮平深刻领会这一思想,谨记毛泽东“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诲,从中国国情出发,更新译文话语。例如,在暴力论的表述上,1930 年译文为“至于社会的运行,赖武力去开辟道路,而打破停滞的,麻木的政治形式……”(吴理屏,1947:244),1940 年译文为“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麻木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工具……”(吴理屏,1947:244)改订本将暴力表述为社会运动这一广泛的社会变革行动,而非社会运行的工具,以凸显其进步性功能,使理论阐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契合。

其次,聚焦问题,查漏补缺。(1)更换底本。旧俄文本中的错误表述严重影响了译文质量。吴亮平遂以德文原本为依据,并参考英文本和 1938 年苏联新订正的俄文本进行修正。(2)补充副文本。鉴于书中所引的杜林词句晦涩难懂,曾有人建议删去相关部分,只保留恩格斯的论述。但吴亮平坚持认为:“第一,恩格斯批驳杜林的论战的部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把杜林的词句删去,就不能不删去论战的部分,如果这样做,就无疑地要减失这书的战斗性。第二,译作应当忠实于原文。如果以为某些读者,需要《反杜林论》的通俗的解释,应当用另一种方式来做。”(吴理屏,1947:4)于是,他翻译了尤琴撰写的一篇《反杜林论》导读文章附于正文之前,以助读者理解。此外,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吴亮平开始注重语言的文学性。毛泽东曾与吴亮平谈及《反杜林论》,他回忆道:“不仅注意书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译的文字。例如哲学编第 11 节末,我用了一句‘太过沉溺于杯中’,毛主席看了说:‘这样好,有味。’”(吴黎平,1980:388)此译法后来亦沿用至数版。于吴亮平而言,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的改订本“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吴黎平,1980:389),基于此的译本改订实现了质的提升。

## 2.2.2 第二次:改进升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方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需要

日益增长,这在读者对于恩格斯名著《反杜林论》的需求上也同样显示出来”(吴黎平,1956:344)。马列著作中译本不再只是党内学习材料,也成为党外人士理解中共的重要途径之一。1952年吴亮平调往北京工作,在研读马列著作时深感“有对译文作一番较大修改的必要”(吴黎平,1980:389),坦言“如果现在我还不进一步加以修改,那么无论怎样说,总是对读者太不负责了”(吴黎平,1980:344)。1954年,他在1950年俄文本基础上,参照德文原本与英文本,“对照了三种本子,采取了个人认为比较易于理解的语句”(吴黎平,1956:345)重译前14章,仔细校改其后的部分章节。

此次改订重点关注译文的可读性,从译者注的数量和内容上可见一斑。初译本有译者注7条,1940年版增至60条,1955年版已达到104条,注释大体可分为三类:(1)补充原未标明的译者注和引用出处;(2)将对“阅读本书有用的”(吴黎平,1956:345)旧俄文本编者注保留并改为译者注,以明责任;(3)新增名词或文句解释,例如,“可是除了物体的力学,如杜林先生说的,还有物体运动之转变为最小分子的运动。①Massen,力学上叫‘质量’,本书为通俗起见,译为‘物体’——译者注”(吴黎平,1956:55)。历次版本的译者注虽都是集中在指示代词、专名、特定用语、计量单位等方面的说明,但新版更趋全面,且更加强调读者意识。例如,“杜林式的包含世界的定数律,是形容词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即形容词与其所形容的对象之间的矛盾,如说木料的铁、圆的方,等等。——译者)”(吴黎平,1956:51)此类新增注释以通俗化的语言、生活化的解释提升了译文的可理解性与接受度,使译本更好地服务于大众的学习与运用。新译本于1955年问世,至1965年3月已印制14次之多。

### 2.2.3 第三、四次:完善定译

1966年“文革”爆发后,马列著作的翻译与宣传陷入停滞。1973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再次对吴亮平的《反杜林论》译文作出鼓励。吴亮平自述:“我知道,这主要不是对我个人的鼓励,而首先是对‘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有力批判。”(吴黎平,1980:389)怀着对“四人帮”的满腔义愤,他对译文作了第三次改订。后因“出版社要重新出版,又作了些名词上文字上的校订”(吴黎平,1974:387),并增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英文本导言。此版于1973年11月完成校对,翌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7年,吴亮平恢复工作。1978年7月至10月,他在回顾《反杜林论》中译本近半个世纪的译改历程时,“深切地铭感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在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深切感念中,完成了第四次校订”(吴黎平,1980:390)。此次改订以文字修饰为主,书后继续附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英文本导言。该版本于1980年8月由已并入人民出版社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总体而言,吴译本的改订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底本更换,由初译时的1894年德文本、俄文本和日文本,到1938年俄文本、德文本及1954年英文本,再到1950年俄文本、德文本和1954年英文本的结合;二是副文本扩展,从最初的译者序和文内注,发展到译者脚注和导读附录;三是版式调整,1956年版起由竖排改为横排,1974年版改用简体字;四是语言修订,1956年版中已有过半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与现行标准一致。自1971年中央编译局版问世后,吴译本的改动甚少,术语表述基本与官方版本统一。至此,《反杜林论》吴译本的内容和风格基本定型,译本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及其相应表述延续至今,相对稳定的文本形态已然形成。

### 3 《反杜林论》国家译本地位的确立

一般而言,具有国家属性的译本多源自国家文本,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直接产物。但并非所有进入国家出版、教育、治理或外宣等体系的译本都出自国家翻译实践。《反杜林论》吴译本几经改订后为国家所用,其地位的变化即为理解此类非典型译本生成的代表性案例。其“国家性”并不源于起点,而在于归宿。此类译本可称为狭义的国家译本,指原本不属于国家文本,却因调整或纳入国家使用而获得国家属性的译本。深入探讨吴译本的演化路径,有助于归纳国家译本的概念、属性与构成要素,为解释国家翻译实践中的类似现象提供参照。

#### 3.1 《反杜林论》改订本地位的演进

《反杜林论》吴译本经历了由个人译本到党内经典,再到国家译本的递进轨迹,其地位演进伴随传播主体的更替与权威性的增强以及传播对象、传播规模和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译本地位的评估可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规模与社会影响等维度综合衡量。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决定其官方认可度,传播对象的广泛性体现其覆盖面与渗透力,发行规模反映社会接受度与现实需求,而社会影响则标志其在意识形态与公共领域中的实际效能。就其早期传播阶段而言,1930年11月,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中文全译本以个人名义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因其内容首发意义重大,很快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多次再版翻印,“在社会科学的古典名著中,这本或许可说是出现最早销行最广的书籍之一”(吴理屏,1947:1)。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极少成段地征引马列著作的原文(吴黎平,1980:389),但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却引用了《反杜林论》吴译本中的两段译文,篇幅达400余字。

延安时期,中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反杜林论》的理论价值得到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充分肯定。1940年校译本完成后,由中共设立的延安解放社出版,以政党名义在党内外传播。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解放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都以这一版本为蓝本,大量再版翻印(姚颖,2019:34)。在党的领导人的介入和政权力量的推动下,译本经改订获得新生,由个人译本上升为党内读本,与中共党建同呼吸,与中国发展共

命运,实现了译本的价值再造。“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特别是在党的历次学习活动中,它都被列为干部学习必读的重要文献,在整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吴亮平,1984:2)

1955年改订本的着眼点在于回应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日益增长的理论与思想需求。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受众群体的急剧扩展催生了译本的转型。吴亮平面向广大读者群体,主动改订译本,积极探索新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规范,推动党建读物普及至基层,助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译本经改订后,既满足了党内思想建设的需要,又兼顾党外传播,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至1957年2月,发行量已逾16万册,并被多个省份的教育厅纳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作为指定学习文件。据查,在1958年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研究室、1959年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60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62年杭州大学政治系资料室、1963年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与党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学习文件中,《反杜林论》相关章节均选自吴亮平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译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出版之前,《反杜林论》吴译本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唯一一部中文全译本(姚颖,2019:58)。1963年,中央编译局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重新翻译《反杜林论》,翻译组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吴亮平的译本,听取了他对新译文的意见。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推出马列著作16开大字本,将《反杜林论》吴译本与编译局版《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经典一并收录。直到1971年编译局版《反杜林论》全译本出版之前,最受读者欢迎、被再版翻印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吴译本(姚颖,2019:58)。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视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周忠良,2023:32)。《反杜林论》吴译本自问世起,一直被视为提高共产党人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武器。毛泽东一生中多次阅读此书,在六七十年代仍反复研读,出行巡视时更嘱工作人员随身携带。他曾读过精装本、平装本、大字本和多种单行本(徐中远,2012:15),却直言“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比不上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雍桂良,2009:320)。胡耀邦亦主张“编译局版和吴亮平版应同时出版”(雍桂良,2009:277)。即使在官方译本发布后,吴译本仍于1973和1978年两度校订完善,以个人署名形式出版,与官方译本同出自一家出版社。可见在国家领导人眼中,吴译本已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译本,甚至可与代表国家形象和权威的官方译本相匹及。据此,一个被国家认可、受国家重视,与国家文本同步纳入出版管控的国家译本形象正式确立。

### 3.2《反杜林论》国家译本的形成机制

国家译本,即译本为国家所有,其功能与权威性超越个人或党派而归属于国家,内含一

定的国家翻译特性。形式上的国家译本是带有国家标识的翻译产品,实质指向翻译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亮平敏锐关注到《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价值和斗争功用,完成全书首译,将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人输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母本(黄自立,2018:112),为先进知识分子深刻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击退各种纷繁庞杂的错误思潮提供了有益参考。随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领导人高度重视《反杜林论》的学习与传播,推动吴译本的改订,进一步提升译文质量。由此形成的改订本具有自发、自主与自利特征,在党领导人的倡导下获得推崇,并在全党范围内广泛使用,为干部学习、思想建党、群众教育、革命指导等提供了理论支持,展现国家译本潜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力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大力推动经典著作的译介与普及。借此时机,吴亮平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指引,适时改订译本,保持译本先进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文本保障。《反杜林论》经其改订完成本土化改造,因契合国家传播需求,被纳入党的出版宣传事业,赋予国家标识出版,进而成为国内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重要来源和大众经典,确立为国家译本。

国家译本的生成与确立,表层缘由在于译本满足了国家不同时期对翻译与战略传播的阶段性需求;深层原因则是译作于国家而言的重要功用被发掘。具体而言,《反杜林论》国家译本地位的演进是一个围绕译本改订展开的国家需求响应及反馈机制(见图1),涉及国家、译者和译本的三方互动。国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需求,直接影响了译者的选材与翻译方向。译本完成并出版后,译者持续关注国家发展动向,不断改订译本,在个人意愿、国家命运与译作功能之间形成深刻的内在关联,使译本具备服务于国家的属性(焦琳等,2025:24)。当其内容、价值、功能与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契合,并通过国家出版、传播体系加以使用和赋权时,即获得“国家译本”资格。国家翻译实践的权威性主要源自国家权力(蓝红军,2020:116),国家文本的翻译通过体制赋权和制度背书获得正当性和普遍效力。国家译本的确立过程与其类似,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持获得权威性。译本在流通过程中,因内容和功能符合国家需求而被采纳,经过审定、出版、推广等环节,确保质量和传播效力。通过制度采纳、政治支持与官方使用,译本逐步具备承载国家意志与战略功能的条件,最终进入国家体系,获得“国家资源”和“国家权威”的背书,完成国家化过程。简而言之,国家的宏观规划影响了译者的翻译选择,而译者通过持续改订贡献国家发展。译本经国家认可与管控,升格为国家译本,成为国家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深度融合为党派译本转化为国家译本提供了天然优势,两者之间呈现出内在的连续性。党内译本并未因国家建立而被颠覆,反而在延续中得以深化,转化

为国家译本。通过将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转化为更具普适性与官方性的表达,国家译本在国家传播与治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以吴亮平《反杜林论》译本为例,党派译本向国家译本的转化具有内在逻辑,但这一转化伴随了多次改订、再版与规范化,逐步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战略需求。且该过程并非自动发生,需满足若干前提条件:首先,党内的意识形态主张需要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以确保翻译内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其次,国家的传播需求、社会文化环境及历史背景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派译本向国家译本转化的可能性。此外,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与修订以及对文本的适应性改编都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环节。因此,党派译本成为国家译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在不同层面进行多维度的协调与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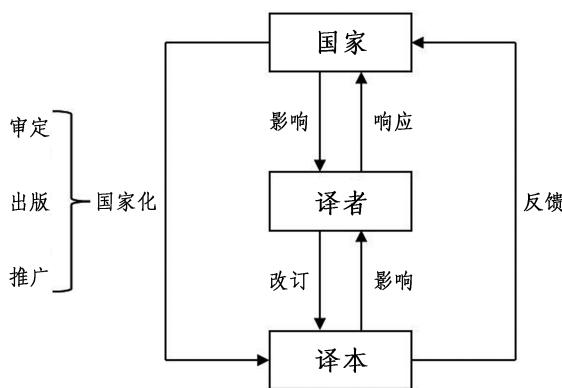


图1 《反杜林论》国家译本的生成机制

#### 4 结语

国家译本是具有明显国家翻译特性,符合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中的国家名义和国家利益特征的翻译文本(任东升等,2023)。带有国家性质的翻译实践成果,受制于国家并作用于国家,与国家发展高度相关。《反杜林论》吴译本始于个人译事,用于中共党建,随中共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上升至国家高度,采用自下而上的生成路径成为国家译本,强调译本价值的挖掘和使用。吴亮平对《反杜林论》的改订及其改订本地位的“国家化”演进,反映了国家对翻译实践的引导和塑造,同时也揭示了党派译本成为国家译本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反杜林论》吴译本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马列著作翻译范本,也是国家译本生成的典型案例。其革新轨迹揭示了译本动态的国家化生成过程,为解释类似国家翻译文本的生成提供了有效视角,同时也为中共翻译史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提供了有益参考,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 参考文献:

陈明明. 2015.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J]. 江苏社会科学(2): 99-114.

-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 1992.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黄自立. 2018.《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3): 107-115.
- 焦琳,任东升. 2025.“为国译”初探[J]. 翻译界(2):22-30.
- 蓝红军. 2020. 国家翻译实践——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J]. 外国语文(5): 112-118.
-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任东升,李佳悦. 2023. 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初探:基于《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的考察[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6): 53-66.
- 任剑涛. 2014.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J]. 学海(2): 76-94.
- 吴黎平. 1956.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吴黎平. 1974.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吴黎平. 1980. 反杜林论[M]. 上海:三联书店.
- 吴理屏. 1932. 反杜林论[M]. 上海:笔耕堂书店.
- 吴理屏. 1947. 反杜林论[M]. 上海:生活书店.
- 吴亮平. 1982.《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N]. 文汇报,1982-5-12.
- 吴亮平. 1983. 我翻译马列著作的经历[J]. 翻译通讯(7): 2-5.
- 徐中远. 2012.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姚颖. 2019.《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考[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雍桂良. 2009.《吴亮平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19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忠良. 2023. 国家翻译治理初探[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 30-37.

##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Translation: A Study of Wu Liangping's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of *Anti-Dühring*

LI Jiayue REN Dongsheng

**Abstract:** *Anti-Dühring* is Engels's seminal work that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es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Marxis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ts first complete Chinese translation, rendered by Wu Liangping, was published in 1930. Over the next five decades, Wu undertook four revisions of the translation, culminating in a final version issued by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1980.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atus of Wu's translation evolved significantly, serving at various stages as a key theoretical tex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thereby functioning as a state transl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revising Wu's edition reflects a practice oriented toward “translating for the state,” trac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by which a party-based translation transitioned into a state translation, thus offering a paradigmatic case of the making of a state transl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revision, both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tate successively imbued the text with state intent and institutional endorsement, endowing it with the defining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state translation.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veals the mechanisms and condition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state translations but also illuminate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arty-affiliated to state-authorized translations.

**Key words:** stat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vision; *Anti-Dühring*; Wu Liangping

责任编辑:陈宁